

论黄侃先生的辞书观

——读《字书编制法商榷》札记

黄孝德

黄侃先生生前没有编过辞书,但他对字典编写提出过一些意见。这些意见,在黄耀先师所整理的黄侃先生的遗著中时有所见。本文为读《字书编制法商榷》^①一文的札记,偶尔也涉及此文以外的一些论述。

一、在“学术闡明,文辞革进”的当代,字书的编制“诚不可缓”

黄先生说:“自叔重《说文》以降,逮于清世字典、字书种类略已说明。”我们国家历史悠久,辞书的编写也源远流长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,我国古代小学十家共四十五篇。在《说文》之前,就有《史籀篇》、《仓颉篇》、《爰历篇》、《博学篇》、《凡将篇》、《急就篇》等字书,但只是字表一类的字书。到东汉许慎著《说文解字》,一部科学的汉语字典才终于问世。《说文》的出现,不仅是汉语字典史上的大事,而且是世界辞典编纂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,这是因为《说文》就其对词义特性和词典性质的理解,就其对释义方法的处理和词典检索法上的成就,它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第一部科学的详解词典的诞生。在西方,这一类单语详解词典,到十七世纪初才出现,我们的《说文》,比西方同类型词典早出现一千六百年左右。^②尽管《说文》的词典编纂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,但它必竟是一部以篆书汉字为说解对象的字书,汉语发展到今天,它作为实用性词典已觉不足,黄先生说:“《说文》虽为众字根源,而去今久远,不适时用”。是符合实际的。

自《说文》之后,晋有吕忱的《字林》,北魏有江式的《古今文字》,是以楷书汉字为说解对象的字典,可惜已经亡佚。今所见最早一部楷书汉字字典,是梁陈之际顾野王的《玉篇》。《玉篇》收字比《说文》多,还补释了许多常见字的常见义,丰富了汉语字书的内容。《说文》注重溯源,而《玉篇》则注重实用。《玉篇》后来经多次增删,与原本《玉篇》颇不一致,但仍不失为一部古代的好字典。

自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之后,汉语字书就沿着两种模式在往下发展。

一种是沿着《说文》注重溯源的模式向前发展。这类字书,以〔唐〕颜元孙的《干禄字书》为代表。它们据《说文》以推究隶书、楷书形体演变的规律,指正俗写形体的讹误,着重于字形上的规范化。张参的《五经文字》,〔宋〕戴侗的《六书故》、郭忠恕的《佩觿》、李从周的《字通》,〔元〕李文仲的《字鉴》,就其编辑的主要意图讲,都属于这一类字书。

另一种字书则沿着《玉篇》注重实用的模式向前发展,着重收集新字、新音、新义,注重词义的引申和例证。宋人所编《类篇》是其代表。《类篇》旧题司马光撰,实际是多人的集体创

作。当时，丁度等人编《集韵》，收集了许多新字、新音、新义，为便于检索，就另用部首归字法编了《类篇》，它突破了《玉篇》的收字系统，释义也前进了一步，基本上把唐、宋两代对字音、字义的解释都写进去了。从古代汉语词典讲，《类篇》是一部好书，在注音、释义上，它不但有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之长，而且，它补释的内容，又正是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之所未备。黄先生是推崇这部书的，他曾说：“看《说文》宜兼看《类篇》。”③《类篇》之后，有〔明〕梅膺祚的《字汇》（以后明清两代又有《字汇补》、《字汇补补》等增补之作）、张自烈的《正字通》、宋濂的《篇海类篇》、李延机的《海篇直音》，〔金〕韩道昭的《五音篇海》④、〔清〕张玉书等人的《康熙字典》，都是《玉篇》一类字书。这类字书当然也有正字的内容，但其编辑的着重点在于收字、注音、释义上的完备。前修未密，后学转精，一般说来，随着时代的推移，汉语字书的编写是在逐渐进步。但从古汉语词典这个角度讲，后来的一些字书，由于在收字、注音、释义上追求完备，就带来了许多问题，这就是黄先生所说的：“流俗识字之书，多籍字典而已。虽翻寻较易，无如其体例不甚雅驯，援据难于凭信。”为了正本清源，方便实用，需要对以往字书给以清理，并在新的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，编写新型字典。黄先生说：“方今学术闡明，文辞革进，诚使文字之业废而不修，恐讹谬滋繁，关系者巨。然则，字书之编制，诚有不可缓之势矣！”黄先生重视辞书的编写和出版，值得我们学习。

二、词书体例要雅驯，援据要可信

如何解决字典编写中“体例不够雅驯，援据难于凭信”的问题？黄先生从汇集材料、断限、编制三个方面发表了一些意见。从三个方面的意见看，黄先生想要解决的是辞书的典范性问题，他期望有一部典范的古汉语详解字典问世。

关于材料的汇集，黄先生说：“材料猥繁，望之或惊其浩瀚。总而论之，亦不外二种：甲，旧小学书；乙，旧传注。传注所包者广，凡依附他书为之作解皆是。”从黄先生要求收集材料的范围看，他期望编写的是一部典范的古代汉语详解字典。

汉语历史悠久，文献资料浩如烟海，资料收集谈何容易。黄先生深知我国遗产中的宝藏，为了利用前人成果，他提出整理《经籍纂诂》，作为古汉语详解字典的资料基础，是有道理的。

汉语的训诂资料，在旧小学书如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说文》、《广雅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等著作中，已有相当规模的收集整理。但在旧小学著作中，这些资料一般未载篇名，不便查考，此外，还有许多经史传注未收集拢来。早在清代乾隆年间，戴震就曾有过纂集传注的打算，但未成篇。到嘉庆年间，阮元督学浙江，才亲订体例，选门下经生数十人，聘臧辅堂、臧礼堂任总纂，采集唐以前古籍中的训诂资料，成《经籍纂诂》。

《经籍纂诂》材料包括：儒家经典和其它古籍本文中的训诂；群经传注中而训诂，以十三经古注为主，附以后人所辑古佚注及唐人注疏中的音训、义训、形训资料；诸子注释；史部和集部注释；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说文》、《广雅》、《释名》、《小尔雅》及后人所辑古小学佚书中的训诂；古籍中异文可资互训者；古籍和碑碣中的假借字资料。由此可见，《经籍纂诂》在古汉语资料的汇集上其范围是广泛的。但它成于众手，亦有讹漏。其按韵分编，亦不便今人检索。黄先生提出：“今若能通校一过，暂用字典编制法编之，次为补其遗阙，此业若成，则材料几于全备矣。”为了弥补《经籍纂诂》对汉唐前音训资料的漏略，他还建议编纂《经籍纂音》一书，就现存小学十书中的资料，“用字典法编为一部”。黄先生认为整理《经籍纂诂》和编辑《经

籍纂音》，就为“编一完备的字书”打下了材料收集的基础。黄先生关于这个方面的意见，为我们编写古汉语详解字典的资料收集，指明了一条简便可靠的途径，值得我们认真考虑。

关于断限。编写一部字书词典，应当根据其规律和性质，对所处理的材料有一个断限。《说文》的材料以秦汉为断限，它反映的是上古汉语的情况。古代汉语发展到唐宋时期，作为中古汉语的形态已经充分具备。编写古代汉语详解字、词典，与编写近代汉语或现代汉语字典词典不同，与源流并重、古今兼收的汉语大字典、汉语大词典也不同，把断限放在唐、宋时期是比较合理的。黄先生说：“自《集韵》以还，字书多难凭信，即有新出之字，并非必要之文。今若编制字书，只当以见于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者为断，纵有增益，宜别作一篇，如《字典》备考之例。”黄先生这个断限的主张，也正是编写一部古代汉语详解字、词典的主张。他要把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以后的材料别作一篇，是因为那是近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材料，用它来解释古代汉语是不典范的。

一部字书，完成了上述两项工作，就可以进入编写了，这就要解决编制中的其它诸多问题。

首先是字的分部问题。《说文》“据形系联”，以五百四十部统摄汉字，开创了汉语字书编写的新纪元。《玉篇》对《说文》部首作了增删，改为五百四十二部，还以类相从，打乱《说文》部首排例的顺序，把五百四十二部分为三十卷，使熟悉《说文》部首的人感到不便查检。《类篇》没有采用《玉篇》的分部系统，它基本上依照《说文》的部首顺序，也是五百四十部。《类篇》对《说文》部首稍有修改，由于改动不大，熟悉《说文》部首的人翻《类篇》仍是方便的。戴侗《六书故》在分部上一反《说文》“据形系联”的原则，打破《说文》五百四十部，据义系联，将全书分为书三十三卷是一种类书式的分部法。由于汉字形义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，这种分部自然会有许多牵强附会，其不利于检索是显然的。汉语字典的分部，到〔明〕梅膺祚编《字汇》才有一个大的改革。《字汇》对《说文》部首实行大合并，简化成二百四十部，纠正了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类篇》等部首过繁的毛病；《字汇》创造了笔画检字法，改变了以往字书中部首顺序和字序上的混乱局面；《字汇》卷首编《检字》，标明该卷所收部首页码。这就使所收汉字的分部和排列有条不紊，人们一检即得，感到非常方便。《字汇》的这些改革，为汉语字典编排上开创了新局面。此后，《正字通》、《康熙字典》都采用《字汇》的分部和检字系统。近人所编《中华大字典》、《新华字典》、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等，将二百四十部进一步简化，实践证明，从《字汇》开始的部首简化，是行之有效的，它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。黄先生是主张“计画寻字”的，但他对简化部首却不感兴趣，他说：“分部之法，只宜暂据《说文》以五百四十为定，何则？字之分部，说者众多，一有更张，反至凌碎，因仍旧籍，于义无妨。”这就不免失之偏颇。

编写汉语字典，字形辨识上要花功夫，要分清那是正字，那是俗写或后起字，这是进入注音、释义之前一个重要的环节。黄先生说：“字分正俗，非徒博好古之名，实则小学疆畛必待此而分明；意义根原必待此而明晰。”不如此，就无法“定体编书”，无法处理互见条目，造成释义的重复和词义系统上的混乱。字形工作的难点就在于如何确定正字。正字明，异体字、讹体字就清楚了。许慎著《说文》就注意了这个问题。《说文解字·自叙》说：“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，九千三百五十三文，重一千一百六十三。”这里所说重文就是异体字（包括俗字、后起字等），而九千三百五十三文，就是许慎所定正字。〔清〕孙星衍《重刊宋本〈说文〉序》说：“许叔重不妄作，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，即史籀大篆九千字，故云叙大篆合以古籀，既并《仓颉》、《爰历》、《博学》、《凡将》、《急就》以成书，又以壁经、鼎彝古文为之佐证，得重文一千一百六十三字。”可见，许慎所定正字是有根据的。《说文》的小篆正字，是《说文》之前历代字书中已有

大篆古籀形体变化而来的,而后来出土的孔壁古文、鼎彝古文与历来字书相合者就收为异体。随着时代的推移,文字孳乳,汉字已从几千个发展到数万个。现存汉字到底有多少?据《汉语大字典》整理近六万个,如果把笔形微异的字都算进去,则有八万个左右,这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积累起来的。《说文》之后,历代以楷书汉字为收字对象的字书,韵书,对异体字不断进行整理,对新出土的古文(包括甲骨文、金文、简文、大篆、小篆及六国文字等)的隶定工作也在不断进行,不断突破《说文》所列正字范围,使字形整理工作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。黄先生重视历代楷书字典中的正字,他指出要“依隶作正,远祖《字林》。”认为“若全依《说文》,必不适用。”但是,黄先生也看到,《说文》的正字,是历代字书、韵书所共同承认的,所以他又指出:“今宜仿《字典》每画中有正有增之例,以见于《说文》者为正,以后出字为增。”这就是黄先生整理异体字的一些办法。这种字分正、俗、先、后的整理工作,因要涉及到许多历史材料,在具体编写中矛盾是很多的,但对一部古代汉语详解字典来说,这个整理的原则,无疑是应当考虑的。

一部楷书汉语详解字典,当然还有一个如何处理甲骨文、金文、篆文、隶书及讹体等问题。黄先生对这个问题没有多作论述,他对《康熙字典》注明古文的办法不甚满意,他要求“自余所载雅则篆籀古文,俗则隶书、讹体,并载字下,以便区分。不得如《字典》仅载其所谓古文而已。”黄先生非常重视《说文》的研究,早年对甲骨文、金文注意不够,晚年已经感到这个问题,并着手研究,但为时已晚,就过早地去世了。因此,在《字书编制法商榷》一文中,他没有提到甲骨文、金文,只是一般地提到“篆籀古文”。

通假字的整理,对一部古汉语详解字典来说,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。在古汉语文献中,假借字甚多,不明假借,则无法读通古籍,也无法搞好字典释义。王念孙说:“训诂之指,存乎声音,字之声同声近者,经传往往假借。学者以声求义,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,则涣然冰释,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,则洁籀为病矣。故毛公《诗传》,多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,已开改读之先,至康成笺《诗》注《礼》,委云某读为某,而假借之例大明。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,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。”^⑤然而,要明假借,就得求本字,本字明,假借乃明,这是整理通假字的关键。《说文》用六书假借来指明本字。汉儒以“声同声近者以意逆之”来求本字。清代王氏父子研治古音系统,从汉儒“某读为某”的例子中得到启发,“考之文义,参之古音”以求本字,对假借问题作了系统的理性的观察。黄先生继承清儒传统,作《求本字捷术》一文^⑥,对这个问题作了集中的解决。在字典编写中,我们运用黄先生的理论,结合古音研究的新成果,就能比较稳妥地解决通假字的整理问题。

字典编写,各项工作的总归就是要落实到注音、释义上来。在这方面,黄先生虽然论述不多,但也是十分精彩的。

在注音方面,黄先生说:“《类篇》于每字之下,必载明有重音、无重音。如有重音,则具其数。此于音学为益,无方今编字书、宜仿其例,不过稍加增补而已。《集韵》、《类篇》亦有遗漏之音。今之增补,一据唐以前小学书;二据唐以前诸书传注。宋吴棫、明杨慎所称音,断不宜汇入。《字典》多据此等书率尔增音,所以不可为典要也。”黄先生还在《论〈康熙字典〉之非》一文中说:“(《康熙字典》)古今杂陈,然否不辨,吴棫杨慎之说本非定论,而亦取之,一弊也。《正韵》之书,乃昔人所云当代不行之典,于今不用之仪,牵取入书,转为审音之障碍,一弊也。所引《唐韵》,清世久无其书,何所依凭,辄造此目,三弊也。引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多与原书不合,四弊也。”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到,黄先生要求编一部古汉语详解字典,要求尽量收集古代字书、韵书和传注中的音释材料,做到每字都有详尽的音释,但要注意典范

性,不能重犯《康熙字典》“然否不辨,古今杂陈”的错误。《康熙字典》用吴棫、杨慎的叶音说作为标注古音的根据,那是在注音上的大错。叶音说是宋以后人读先秦古籍时因不明语音演变而临时改读的音。《洪武正韵》是元以后的音,与标志中古音系统的《广韵》《集韵》混在一起使用,也说明《康熙字典》的编者缺乏审音所必要的历史知识和功力。这些方面的错误,使《康熙字典》注音的典范性受到极大的损害。黄先生是著名的音韵学家,他提出过古声十九类和古韵二十八部的学说,他是熟知个中情况的人,所以他的批评是十分肯切的。他的这些意见,对我们今天辞书注音工作如何才能反映历史的实际,符合汉语语音发展的规律,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。

在释义方面,在黄先生的著作中,没有专门谈字典释义的文章。黄先生是著名的训诂家,他有丰富的从训诂角度谈释义的言论,对字典释义良多教益。例如,黄先生说“治小学不可讲无条例之言与无证据之言”^⑦这对字典释义是一条最基本的要求。又如,他曾提出:“小学之训诂贵圆,经学之训诂贵专”^⑧我以为这里的“圆”,就是“圆通”,指词在诸多语言环境下的概括性、普遍性;这里的“专”,就是“专一”,指词在特定语言环境下的具体性、特殊性。这种对小学训诂的要求,就是对字典词典释义的要求。在这方面,论者已多,我就不多说了。

三、余 论

黄先生的辞书观,集中表现在他对汉语字典、特别是古代汉语详解字典编纂的一些看法上。汉语字典与汉语词典是有区别的,黄先生没有从收集词条、词典性质等角度来谈词典编写,使他的辞书观缺少了一部分内容。但是,汉语字典,从来就和汉语词典有不可分割的关系,它在注音、释义、编排体例等方面,是有许多共同语言的。学习黄先生关于字典编写的论述,继承这份遗产,对我们当前辞书编写和出版,将有极好的教益。

注释:

① 见黄侃述黄焯编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第14——17页。以下引文,除注明者外,皆出此文,不另作注。

② 关于《说文解字》在世界辞典史上的地位,请参见许嘉璐著《〈说文解字〉在词典史上的地位和价值》一文(中国训诂学会许慎学术讨论会油印稿)。又〔苏〕B·T·加克著《词典学发展的某些规律》一文亦可参改。此文载石肆壬选编《词典学论文选译》商务印书馆版第85——104页。

③ 见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第71页。

④ 此书又名《五音类聚》、《四声篇海》,今国内各馆藏三十七种,皆为改并本。此书将《玉篇》、《类篇》、《奚韵》、《龙龕》、《对韵音训》、《并了部头》、《余文》、《川篇》、《搜真玉镜》、《俗字背篇》等多种古字书集为一部。《康熙字典》在编写时用了它不少材料。

⑤ 见王引之《经义述闻·自述》。

⑥ 见旧中央大学文艺丛刊《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》。

⑦ 见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第12页。

⑧ 见《文字声韵训诂笔记》第192页。